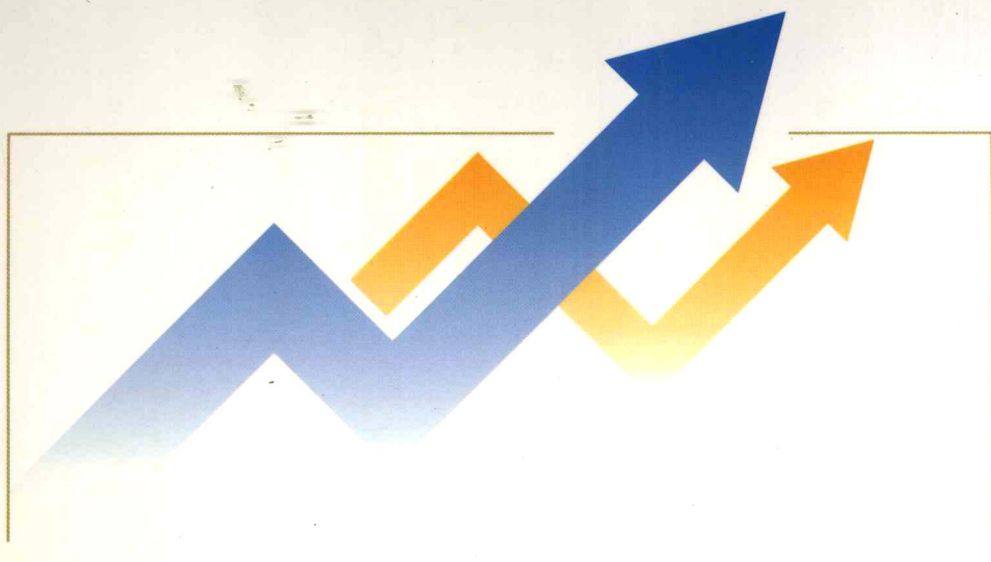




CHINA'S HIGH SAVINGS:
Stylized Facts and Sector Analysis

中国的高储蓄

——特征事实与部门分析

○ 张明 著



中国金融出版社

CHINA'S HIGH SAVINGS:
Stylized Facts and Sector Analysis

中国的高储蓄

——特征事实与部门分析

○ 张明 著

 中国金融出版社

责任编辑：何 为

责任校对：孙 蕊

责任印制：尹小平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的高储蓄 (Zhongguo de Gaochuxu) ——特征事实与
部门分析/张明著.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 1

ISBN 978 - 7 - 5049 - 4866 - 3

I. 中… II. 张… III. 过度储蓄论—研究—中国
IV. F832.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68700 号

出版

发行

中国金融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广安门外小红庙南里 3 号

市场开发部 (010)63272190, 66070804 (传真)

网上书店 <http://www.chinafph.com>

(010)63286832, 63365686 (传真)

读者服务部 (010)66070833, 82672183

邮编 100055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保利达印务有限公司

尺寸 160 毫米×235 毫米

印张 12.5

字数 483 千

版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5.00 元

ISBN 978 - 7 - 5049 - 4866 - 3/F. 4426

如出现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联系电话 (010)63263947

序

余永定

近年来，中国经济学界正在涌现出一批基础扎实、视野开阔、思想活跃、理论联系实际的青年经济学家。这些青年人立足于本土，对国外的经济学理论和文献也有很好的把握。这些青年经济学家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对学术研究有浓厚兴趣，有很强的团队精神，“对职位、牟利，对上司的恩典，没有任何考虑”（恩格斯语）。我认为，这些青年经济学家代表了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希望。张明博士正是这个正在兴起的青年经济学家群体中的佼佼者之一。

张明博士本科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1999年至2002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指导老师是何璋教授）；2004年至2007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系攻读博士学位（我是他的指导老师）。张明博士的勤奋好学以及对经济学理论的悟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所撰写的博士论文《中国的高储蓄——特征事实与部门分析》受到了答辩委员会评委的一致好评。张明博士的专著《中国的高储蓄——特征事实与部门分析》是他对博士论文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消费理论（储蓄是可支配收入减去消费的剩余项，储蓄理论不过是消费理论的镜像反映）是宏观经济理论中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最重要特点则是高储蓄、高投资和出口导向。这种增长模式，在过去30年中取得巨大成功，也造成了中国今天经济增长的严重不平衡。因而，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研究消费理论（储蓄理论）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中国的高储蓄——特征事实与部门分析》一书致力于回答中国的储蓄率为什么居高不下的问题。与其他同类著作不同的是，本书从中国部门储蓄率的特征事实出发来寻求解释，即与其他

以高储蓄率著称的东亚国家相比，中国的居民储蓄率、政府储蓄率和企业储蓄率都居高不下，而其他东亚国家这三部门中只有一个或两个部门储蓄率很高。那么解释这三部门储蓄率为什么同时处于高位，就成为本书的主题。

《中国的高储蓄——特征事实与部门分析》一书从两个角度来展开分析。首先，它依次分析居民、政府和企业储蓄率各自居高不下的原因。中国居民储蓄率很高的原因包括谨慎性储蓄动机、流动性约束、人口年龄结构、长期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城市化等；中国政府储蓄率很高的原因主要是公共产品支出在财政支出中比例过低，根源则是1994年税制改革造成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不匹配所致；中国企业储蓄率很高的原因包括近年来企业利润普遍上升、企业利润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较高，以及各种所有制类型的企业很少分红或发放现金股利等。

其次，《中国的高储蓄——特征事实与部门分析》一书创新性地指出，中国之所以三部门储蓄率同时处于高位，在于各部门储蓄之间缺乏类似于发达国家那样的相互抵消机制。例如，在发达国家，由于李嘉图等价的存在，一旦政府扩大消费性支出（即政府储蓄下降），那么居民将意识到政府未来征税可能性上升，因此居民将削减当期消费（居民储蓄上升）。反之则相反，即政府储蓄和居民储蓄之间存在相互抵消机制。又如，在发达国家，由于居民是企业的所有者，因此一旦企业扩大分红（企业储蓄下降），则居民意识到自己持有的股权价值下降，因此会减少当期消费（居民储蓄上升）。反之则相反，即企业储蓄和居民储蓄之间存在相互抵消机制。然而在中国，由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性公共产品供应不充分，导致居民谨慎性储蓄动机强烈，加上政府开支中用于社会性公共产品支出的比重很小，导致政府储蓄和居民储蓄之间的抵消机制不显著。而且，由于中国居民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有限，且上市公司缺乏分红的文化，导致居民储蓄与企业储蓄之间的抵消机制不显著。这正是为什么中国三部门储蓄率同时处于高位的根本原因。

《中国的高储蓄——特征事实与部门分析》一书的第七章将政府支出纳入居民效用函数，将政府预算约束和企业股利纳入居民预算约束，推导出代表性主体的消费函数；通过一系列简化现实的假设，从个体消费函数推导出总体消费函数，因此在加总问题上取得一定进展，这是本

书的重要理论创新。

当然,《中国的高储蓄——特征事实与部门分析》一书也存在一些缺陷。例如,在理论创新方面,个体消费函数依然缺乏中国的制度性特色,而且加总过程与个体消费函数的推导实际上是脱节的,对加总的处理过于简单;又如,本书的计量分析较为薄弱,仅运用了普通 OLS 方法,有些代理变量或工具变量的选择也值得商榷。

尽管存在上述缺陷,但瑕不掩瑜,《中国的高储蓄——特征事实与部门分析》仍不失为一部有价值的学术专著。阅读本书,不仅可以使我们了解张明博士个人对消费理论研究的心得体会,还可以使我们对国内外消费—储蓄研究文献的了解得到更新和补充。我愿意向广大经济学理论工作者,特别是向在读博士生推荐张明博士的专著《中国的高储蓄——特征事实与部门分析》,并预祝张明博士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取得更大的成绩。

目 录

前言	1
一、理论意义	1
二、研究方法	2
三、论文结构	3
四、创新和不足	7
 第一章 中国储蓄率的特征事实：历史回顾和国际比较	8
一、储蓄率的定义和核算	8
二、中国储蓄率的历史回顾	9
三、储蓄率的国际比较	16
四、小结	24
第一章附录：日本和美国的储蓄率差异	24
 第二章 储蓄（消费）理论的演进：文献综述	28
一、概述	28
二、储蓄（消费）理论的演进	28
三、经验研究对 REPI 假说提出的挑战	34
四、对 REPI 模型的修正	37
五、当前主流模型面临的最大问题——加总	45
六、小结	46
 第三章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际储蓄率研究最新进展	48
一、储蓄率的基本决定因素	49

二、人口因素与储蓄率	53
三、社会保障制度和储蓄率	55
四、储蓄率的国别研究和地区比较	59
五、对中国高储蓄率的研究	62
第四章 中国居民储蓄分析	65
一、概述	65
二、文献综述	66
三、计量分析 I	69
四、计量分析 II	79
五、小结	80
第五章 中国政府储蓄分析	82
一、概述	82
二、中国高政府储蓄率的成因分析	84
三、中国政府储蓄率的中期趋势——情景分析	93
四、政府储蓄和居民储蓄的关系	95
五、小结	101
第六章 中国企业储蓄分析	102
一、概述	102
二、中国高企业储蓄率的成因分析	104
三、企业储蓄与居民储蓄的关系	118
四、企业储蓄与政府储蓄的关系	122
五、小结	123
第七章 中国居民消费函数：推导、加总与验证	125
一、概论	125
二、中国居民个体消费函数的推导	126
三、消费函数的加总	132
四、统计检验	136

五、小结	140
第八章 结论和政策建议	141
一、居民储蓄	141
二、政府储蓄	142
三、企业储蓄	143
四、居民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的关系	143
附录一 中国国内储蓄、投资和贸易顺差的未来演进趋势	146
一、引言	146
二、中国储蓄率的决定因素和未来演进趋势	147
三、中国投资率的决定因素和未来演进趋势	153
四、中国储蓄投资缺口和贸易顺差的未来演进趋势	156
附录二 储蓄率模型的演变和储蓄率决定的经济性因素	159
一、引言	159
二、储蓄模型的演变和储蓄率决定的经济性因素	160
三、小结	168
参考文献	170
一、中文部分	170
二、英文部分	172
博士论文后记	186
后 记	189

前言

一、理论意义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的诸多特征最终可归因于高储蓄。首先，流动性过剩（excess liquidity）的直接原因是外汇储备激增引致的外汇占款增加（由于强制结售汇制度的存在以及冲销的不完全），外汇储备激增则源自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双顺差，而经常账户顺差又源自国内投资低于国内储蓄。其次，中国经济增长更多依赖于投资推动和出口拉动，而非国内消费推动。投资效率的不断下降和国际贸易摩擦的加剧给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蒙上了重重阴影，因此扩大内需成为当务之急。扩大内需就意味着提高消费（降低储蓄）在 GDP 中的比重。最后，在当前中国国内，迅速增长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偏低的投资效率并存。固定资产投资的融资来源包括企业自筹、银行贷款和政府融资。近年来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迅速可归因于以上三种来源的资金供给都很旺盛，而这三种融资来源分别对应着企业储蓄、居民储蓄和政府储蓄。

尽管宏观经济学在储蓄、投资、增长之间的关系方面还存在争议，但从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发展历程来看，高储蓄融通高投资、高投资推动高增长、高增长带来更高储蓄的善意循环是存在的。高储蓄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如果储蓄投资转化机制缺乏市场化和透明度，投资就会变得缺乏效率，那么高储蓄推动的高增长就令人怀疑，这正是所谓“东亚模式”令世人诟病之处；如果居民过度重视储蓄而忽视消费，这不仅会降低当期福利水平，而且会导致消费对增长推动不力，从而陷入凯恩斯所谓的“节俭悖论”；如果

不同国家的边际储蓄倾向有所差异，那么在资本市场开放前提下，高储蓄国家必然会通过持续的经常账户顺差为低储蓄国家提供融资，这也正是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将当前国际收支失衡归因于东亚国家和产油国“过度储蓄”（saving glut）的原因。

消费和投资是宏观经济学中最基础的问题，消费和投资的增长与波动形成了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储蓄既是可支配收入减去消费的余额，与消费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又是投资的唯一来源。因此储蓄也是宏观经济学的基础问题之一，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储蓄是一种美德还是一个问题？中国的储蓄率是过高还是正常？笔者认为，对中国储蓄问题作整体价值判断是困难的，这有赖于对中国高储蓄现象本身及其成因和形成机制的准确把握。因此，本书并不打算对中国高储蓄问题进行任何形而上的价值判断，而是努力厘清当前中国高储蓄的特征事实，分析高储蓄现象的成因和形成机制，运用理论和实证研究来更好地解释中国高储蓄现象，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研究方法

迄今为止中外学者对储蓄问题的研究或者重视国民储蓄（national saving），或者重视居民储蓄（household saving），而相对忽视了对国民储蓄与居民储蓄的差额——政府储蓄（government saving）和企业储蓄（corporate saving）的研究。其原因在于，在理性预期和完全资本市场等假定下，居民会准确计算政府储蓄或企业储蓄变动对居民未来财富水平的影响，从而预先主动调整其消费行为，均衡结果是居民储蓄变动将会抵消政府储蓄或企业储蓄的变动，从而平滑国民储蓄。以上机制被称为“李嘉图等价”（Ricardian equivalence）和“刺破企业面纱”（pierce the veil of corporate）。

针对发达国家的经验研究显示，由于理性预期和完全资本市场等假定在现实中并不成立，因此居民储蓄对政府储蓄或企业储蓄的替代效应是不完全的，从而进一步认为，居民储蓄对政府储蓄或企业储蓄的替代效应，在中国可能更加微弱，这是因为中国财政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共财政，中国资本市场尚未健全和成熟。一个合乎逻辑的猜想是，中国

国民储蓄率居高不下，很可能是因为居民储蓄、政府储蓄、企业储蓄三者之间不能相互替代，从而出现三足鼎立的局面。

将中国部门储蓄率数据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初步证实了以上猜想。近年来在东亚国家，日本的居民储蓄率和政府储蓄率较低，而企业储蓄率较高；韩国的居民储蓄率较低，而政府储蓄率和企业储蓄率较高；新加坡的企业储蓄率较低，而居民储蓄率和政府储蓄率较高。中国的居民储蓄率低于新加坡，政府储蓄率低于韩国，但国民储蓄率在东亚国家中最高的原因，正是因为三部门储蓄率都处于较高水平。^①

为了更深入地分析中国高储蓄，本书采用了部门分析框架。首先，逐一分析居民高储蓄、政府高储蓄、企业高储蓄的成因；其次，运用计量方法对居民储蓄率与政府储蓄率、居民储蓄率与企业储蓄率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再次，把政府和企业行为引入居民的跨期优化决策中，推导出跨部门预算约束下的居民消费函数，并用中国的时间序列数据对该函数进行统计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高储蓄的成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居民储蓄、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各自背后的经济性因素和制度性因素；二是制度性因素阻塞了各部门储蓄率之间相互抵消的渠道。相应的政策建议既包括对症下药地降低各部门储蓄率，也包括通过制度变革来建立部门储蓄率之间的联系。

三、论文结构

规范的学术著作应符合提出问题—文献综述—理论分析—经验检验—政策建议的范式。本书基本上遵循这一范式。全书分为八章：第一章通过历史回顾和国际比较，总结出中国高储蓄的若干特征事实，以此作为分析基础；第二章对储蓄（消费）理论的发展进行综述，重点介绍修正后的理性预期持久性收入模型，以此作为理论基础；第三章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储蓄率研究的最新进展进行综述，重点梳理了

^① Kuijs (2005) 是最早讨论中国分部门储蓄率的文献之一。该研究指出，中国近年来储蓄率的上升可以完全归因于企业储蓄率和政府储蓄率的上升；企业储蓄已经超过居民储蓄成为中国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最重要来源。

人口结构转变与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程度与储蓄率变化之间的关系；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分别对中国的居民储蓄、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以及各部门储蓄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研究；第七章在跨部门预算约束下推导中国居民个体消费函数，通过加总得出总体消费函数，并对该函数进行统计检验；第八章是结论和政策建议。全书最后增加了两个附录。附录一研究了中国国内储蓄、国内投资与贸易顺差演进之间的相互关系，部分弥补了正文中尚未论及外国储蓄的不足。附录二用一个简明的框架概述了储蓄（消费）模型的演变，作为对正文第二章的一个有益补充。

第一章“中国储蓄率的特征事实：历史回顾和国际比较”提供了全文的分析基础，相应特征事实包括：中国国民储蓄率无论与发达国家还是与发展中国家相比都处于很高水平；和其他东亚国家相区别，近年来中国居民、政府和企业三部门储蓄率同时处于较高水平；中国 2000 年以来国民储蓄率的增长应主要归因于企业储蓄的增长。

第二章“储蓄（消费）理论的演进：文献综述”回顾了储蓄（消费）理论的发展历程，并重点介绍了当前主流的理性预期持久性收入假说（real expectation 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 REPI）。REPI 模型不断修正的过程事实上是凯恩斯主义消费理论与新古典主义储蓄（消费）理论不断融合的过程。其关键在于当期消费除受持久性收入影响外，也受当期收入影响。在修正过程中逐渐引入谨慎性储蓄动机、流动性约束、耐用品消费、有限寿命、习惯等因素，从而增强了 REPI 模型解释现实的能力。REPI 模型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加总，即如何由代表性主体的消费函数推导出整体消费函数，这很可能是储蓄（消费）理论未来发展的一大方向。

第三章“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际储蓄率研究最新进展”概述了近年来国际经济学界关于各国居民储蓄率和国民储蓄率的研究成果。从储蓄率的基本决定因素来看，除了传统的人均收入、经济增长速度、利率等因素外，人口因素、预防性储蓄动机、宏观经济政策冲击、外部融资条件、贸易条件冲击和教育等因素对储蓄率的影响也得到了越来越深入的讨论。在对众多因素的讨论中，人口结构的转变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程度（谨慎性储蓄动机）与储蓄率变化的关系一直是讨论的重点。

由于储蓄率在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分布并不均衡,因此很多研究文献都致力于解释个别国家储蓄率过高或过低的原因,或者比较国别间或地区间储蓄率的高低并探究其原因。最近几年来,中国的高储蓄现象受到了国际经济学界更多的关注。

第四章“中国居民储蓄分析”发现,中国居民高储蓄完全可以用修正后的 REPI 模型来解释,主要动因包括谨慎性储蓄动机、流动性约束、高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人口红利、城市化程度等。随着人口结构的老齡化、实际财富水平向目标财富水平的趋近、城市化比率的提高,以及利率市场化的推进等,中国居民储蓄率将在长期内逐渐走低。

第五章“中国政府储蓄分析”认为中国政府高储蓄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的财政支出中,用于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社会公共产品的消费性支出所占比例过低,其根源在于 1994 年税收制度改革造成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脱节。随着中国财政体制的转型,政府储蓄率将在中期内显著下降,从而给财政平衡带来压力。针对政府储蓄和居民储蓄之间关系的经验研究发现,李嘉图等价在中国并不成立,政府消费对居民消费是显著挤入的。因此,增加社会公共产品支出的财政政策能够同时降低政府储蓄和居民储蓄。

企业储蓄已成为中国国民储蓄最重要的来源。企业储蓄激增的后果是固定资产投资效率下降和宏观调控政策效力减弱。第六章“中国企业储蓄分析”发现,近年来企业储蓄迅速增加的原因包括企业利润增长较快、企业利润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较高,以及中国企业的股利支付率普遍较低。针对企业储蓄与居民储蓄之间关系的经验研究显示,由于中国股票市场不发达、上市公司缺乏分红的习惯,以及居民持股不太普遍,造成所谓“企业面纱”并不存在。此外,虽然中国政府是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最大股东,但是从 1994 年开始国有企业不再向政府分红,该项制度安排切断了政府储蓄与企业储蓄之间本应具有替代关系。

第七章“中国居民消费函数:推导、加总与验证”是本书的主要理论创新。首先,通过把政府支出纳入居民效用函数、将政府预算约束和企业股利分配纳入居民预算约束,以及引入一个不变绝对风险规避效用函数,推导出中国居民的个体消费函数,并将部门储蓄的相互影响与

谨慎性储蓄动机等制度性特征包含进来；其次，通过一系列简化现实的假设，从居民的个体消费函数推导出总体消费函数，通过加总过程将收入增长率、人口年龄结构等变量引入进来，从而为用中国宏观数据检验生命周期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最后，对中国居民消费函数的统计检验表明，经验数据和模型预测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吻合的，这既说明回归方程的设定是成功的，也验证了 REPI 模型对中国居民消费的解释力。

第八章“结论和政策建议”指出，储蓄率的高低其本身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储蓄率的形成机制是否扭曲，部门储蓄率相互作用的渠道是否被阻塞，储蓄投资转化机制是否透明和市场化。降低居民储蓄率的建议包括政府扩大公共产品支出以降低居民谨慎性储蓄动机、深化金融市场改革以缓解流动性约束，以及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降低政府储蓄率的建议是尽快实现中国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的匹配，并加大公共产品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降低企业储蓄率的建议包括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要求国有企业向政府分红、培育中国上市公司发放现金股利的习惯，以及消除中小民营企业面临的流动性约束。增强居民储蓄和政府储蓄之间联系的建议是扩大公共产品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增强企业储蓄和居民储蓄之间联系的建议是进一步完善中国股票市场，提高居民持股水平；增强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之间联系的建议是要求国有企业向政府分红。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出现了持续的贸易顺差。根据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贸易顺差即等于国内总储蓄与国内总投资的差额。附录一“中国国内储蓄、投资和贸易顺差的未来演进趋势”首先分析了中国储蓄率的决定因素并预测了储蓄的未来演进趋势，其次分析了中国投资率的决定因素并预测了投资的未来演进趋势，最后根据两个不同的情景预测了储蓄与投资差额以及贸易顺差的未来演进。

附录二“储蓄率模型的演变和储蓄率决定的经济性因素”试图用一个简明的框架来解释储蓄率是如何决定的。该文通过对储蓄模型的不断拓展来引入各种经济性因素。在结论部分，通过一个表格来系统归纳储蓄率和各种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一旦了解储蓄率与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我们就能够在恰当的时机，选择恰当的政策工具来影响恰当的因素，从而间接调整储蓄率的高低。

四、创新和不足

中国高储蓄一直是中外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非常关注的问题，相关研究文献众多。但是绝大多数文献都只关注居民储蓄率或国民储蓄率，对政府储蓄率与企业储蓄率的关注有所不够。大体而言本书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

第一，从中国三部门储蓄率均处于较高水平的特征事实入手，创建了一个针对中国高储蓄的部门分析框架。通过该框架，既能剖析造成各部门储蓄率居高不下的经济因素或制度因素，又能探究各部门储蓄率之间的联系。部门分析框架是全书的关键创新之所在。

第二，本书对中国高储蓄现象的一个重要解释是，在居民储蓄、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之间并不存在理论上的替代关系，即李嘉图等价和“刺破企业面纱”均不成立，因此刺激居民消费的关键在于强化居民储蓄与政府储蓄、企业储蓄之间的替代关系。以上结论和政策建议是本书的一大创新。

第三，本书通过将政府支出入居民效用函数，将政府预算约束和企业股利纳入居民预算约束，推导出代表性主体的消费函数；通过一系列简化现实的假设，从个体消费函数推导出总体消费函数，因此在加总问题上取得一定进展，这是本书的重要理论创新。

本书不足之处在于：其一，除居民储蓄、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外，国民储蓄还包括外国储蓄（foreign saving）。近年来中国的外国储蓄持续为负，具体表现为经常账户持续顺差。由于篇幅所限，以及负外国储蓄无非是其他三部门储蓄的运用，因此本书没有对外国储蓄进行专门分析。^①其二，本书对消费函数的加总处理过于简单，例如，假设经济体中只有两种类型的消费者和两种类型的消费函数，这种处理虽然简化了数学推导，但同时也限制了能够取得的进展。其三，受可获得数据的限制，尤其是中国部门储蓄率时间序列长度的限制，本书计量分析的说服力略显不足。受论文篇幅和写作时间的限制，本书没有采用一些更为流行和有效的计量回归方法。以上不足将成为我们未来研究的方向。

^① 附录一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

第一章

中国储蓄率的特征事实： 历史回顾和国际比较

一、储蓄率的定义和核算

储蓄（saving）是指未耗尽的收益。它既是个人的行为，也是整体经济运转的一种结果。个人储蓄的主要构成是在金融机构中的存款，此外也可以表现为实物形式（例如，购买房产或艺术品）。从整体经济来看，除了和其他国家的往来外，储蓄专指资本积累。^①

在国民收入账户（national income and product account, NIPA）中，储蓄是一种余额（residual）：国民储蓄（national saving）等于国民产值（national product）与最终消费（final consumption）之差，国内储蓄（domestic saving）等于国内产值（domestic product）与最终消费之差，国民储蓄与国内储蓄之差是净海外资产收入。

储蓄有总储蓄（gross saving）和净储蓄（net saving）之分。国民总储蓄等于国民总产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 GNP）减去最终消费，国民净储蓄等于国民净产值（net national product, NNP）减去最终消费，国民总储蓄与国民净储蓄之差是折旧。

如果按部门来划分，国民储蓄可以分为公共部门储蓄（public sav-

^① 以上定义引自《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中“Finance and Saving”词条，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